

进一步搞好 文化遗产研究领域里的革命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

徐安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三年了。在当前轰轰烈烈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重温毛主席的这篇文献，对于我们进一步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搞好文化遗产研究领域里的革命，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在《讲话》中，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毛主席还指出，要作到这些就必须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毛主席光辉指示的指引下，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文化遗产研究中同形形色色的封、资、修观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时也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更是以空前的规模对文化遗产研究这个领域进行了一次清扫，无产阶级夺回了这个被资产阶级长期把持的领域。然而我们尽管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因此，我们还必须在毛主席《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为彻底进行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改革而努力作战。

要作战，就要解决方向问题。这不是说口头上的解决，而是说行动上的效果。认真总结一下我们在文化遗产研究上的经验教训，就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三十三年前指出的“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的情况，至今仍然严重存在着。这里仅就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问题，粗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是要不要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指导文化遗产研究的问题。

批判孔孟之道，研究儒法斗争，总结历史经验，都应该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不同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科学地说明历史人物同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是为大家所熟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可是就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背离了

它，迷失了方面。

请看下面的例子：

如对《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分析，有的同志就根本不管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分析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他们抛开了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讲什么鸿门宴的斗争是刘邦、项羽之间狗咬狗之争。他们完全赞同作者司马迁的错误思想倾向，不仅不批判项羽大搞分裂、倒退、复辟的儒家路线，反而为其失败惋惜。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曲解了毛主席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来作为这种错误分析的依据。他们无视毛主席诗句中关于必须批判孔孟之道，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继承儒家衣钵，分裂革命队伍，大搞阶级投降，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罪行等等内容，却抽象地谈什么要把项羽作为“宜追穷寇而不追的借鉴”。这就严重地歪曲了毛主席的教导，也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造成了混乱。

又如对苏轼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这个孔孟之徒、巧伪人，评价是肯定的。一些人千方百计地为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运动辩护，并把他乔装打扮为所谓“关心人民疾苦”的“清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虽然“清官”不提了，但他的一些作品仍被一些同志推崇备至。如对《题西林壁》这首诗，不少同志就赞不绝口，说它写出了“在认识论上很有意义的命题，即应当防止主观片面性”。不仅如此，这首诗还曾选进新编中学语文课本，用来教育下一代。这首诗果真应该赞美吗？不是！这是一首好诗吗？不是！它是一株毒草，其矛头是直端端指向王安石变法的。我们知道，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是丑态毕露的。在变法初期，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在变法高潮中，他又摇身一变，表示拥护。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一〇七九年），御史李定等人摘出他反对新法的诗句，撕下了苏轼两面派的画皮，加以弹劾，他于是被捕入狱。苏轼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公元一〇八三年）移任汝州团练副使。《题西林壁》就写在他由黄州移任汝州，过着贬官生涯的时候。这首诗表面看来是写庐山，但从苏轼的思想和经历来看，却是含沙射影，意在言外。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是说他投机革命失了算；“不识庐山真面目”，是说他没有看清王安石，新法给了他无情的打击。字里行间浸透了他对新法的刻骨仇恨。苏轼在另外一些诗中，就打起“为民请命”的破旗，大写所谓变法的“庐山真面目”了，《吴中田妇叹》就是突出的代表。在这首诗中，他以“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的句子，用汉代龚遂，黄霸的典故攻击王安石变法，说朝廷中主张改革“体恤民情”的人越多，老百姓就越被逼得只有去跳河。苏轼对王安石变法咬牙切齿的仇恨是表现得何等的充分啊！可是，这些东西却为这些同志所肯定了，把一个孔孟之徒，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打扮成了“关心民间疾苦”的“英雄”。这种倾向难道不值得警惕吗？这正如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所尖锐批评的那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毛主席的尖锐批评虽然主要是针对党内那些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但是联系以上的种种问题，

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这些同志的严重警惕吗？

第二，是要不要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可是，由于我们的一些同志受资产阶级纯学术研究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很深，还远远没有作到这一点，甚至直接违反毛主席的上述教导。

如对《水浒传》中宋江这个形象的评价，一些同志就认为宋江是值得肯定的。他们认为，宋江毕竟是起义军的领袖，为农民革命作过贡献；宋江的妥协、投降，接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只是局限，次要方面而已。这种评论，我们认为十分错误的。毛主席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曾经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对宋江持肯定态度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正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了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表现。《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前是一个恪守孔孟之道的“孝子”，对农民起义深恶痛绝。参加起义后，宋江第一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表示对赵宋王朝的忠心；并时时说明他上梁山是出于无奈，从来都无“造反”念头。宋江在梁山泊推行的是一条投降招安的路线，大肆网罗地主、官僚，无情打击坚持革命的李逵，充当了宋王朝在起义军中的内奸。当他投降的阴谋得逞后，就征方腊，平田庆，死心踏地地充当了地主阶级的走狗和帮凶。纵观宋江一生，他正是武训一类的人物，“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象这样的内奸、走狗，怎么可以肯定呢？必须指出，如何评价宋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象宋江这样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叛徒，至今仍大有人在，如林彪一类。只要我们把林彪和宋江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对难兄难弟。这两个家伙，出身一样，教养相同，都是孔孟的忠实信徒；都是把革命队伍作为“暂栖身”的场所，时刻不忘投降、叛变。只是时代不同了，宋江投靠的是赵宋封建王朝，希望捞取一官半职，“留得一个好名”；林彪投靠的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梦想当儿皇帝。因此，对宋江的批判应该同批判革命队伍中的软弱、妥协思想，以及清算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叛徒、卖国贼的罪行结合起来，古为今用。那种替宋江开脱，为投降辩护的观点，对深入批判卖国贼林彪的罪行，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是唱反调的。

又如对《高祖还乡》这套散曲的评价。有的同志因为《高祖还乡》“骂了皇帝”，就特别赞赏，说这套曲子“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前暗偷暗盗的无赖行为和作了皇帝以后作威作福的丑恶面孔作了尽情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蔑视和反感”；又说，这套曲子还“不是从本质上揭露刘邦，所以思想不够深刻”，就是说还没有骂够。可不可以骂刘邦？这不是争论焦点，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骂他。大家知道，刘邦所处的时代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刚刚建立，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异常

尖锐的时代，他顺应历史潮流，反对复辟势力，为封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因此，刘邦是一个大法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当然，刘邦也有他的缺点和污点，那就是他对农民起义果实的侵占，以及反复辟的不彻底性等等。本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刘邦的局限加以说明，进行批判，使人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高祖还乡》的描写根本不是如此，它是以虚构的情节、捏造的故事来歪曲历史，发泄作者对“出身微贱”的“小人物”敢于打倒“高贵”的“大人物”的仇恨。象这样地“骂皇帝”的作品，正反映了保守势力对新生力量的恐惧和扼杀，是我们应当严肃批判的。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却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作具体分析，不看作品的倾向，把糟粕当作精华肯定。很显然，这对我们批判林彪一类骗子疯狂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革命罪行，是影响很坏的。这样的教训说明，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去研究历史，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

上述情况都是发生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间，大多数也还是认识上的问题。虽然如此，但值得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什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些情况还这样严重地存在着呢？这正是毛主席在《讲话》中早就尖锐地指出过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清除“资本主义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我们就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指示办事，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刻苦改造世界观，清除自己头脑中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树立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我们决不能再走老路，重犯过去的错误了。我们一定“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真正做到毛主席所教导的：“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和上述一些同志一样，过去我自己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也不是很清楚的。让我们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认真读书，深入开展文化遗产领域的革命，古为今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作战！